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酝酿和确立

■ 陈锦华

从1990年8月到1993年3月，我在国家体改委工作了两年半。时间虽然不长，但这段时间正是中国改革的关键时期，是一段不平凡的经历。

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有些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就是被市场搞坏了，反对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声调很高，甚至跟“走资本主义道路”都联系起来了，帽子很大。所以，我很小心。

国外经济体制司副司长江春泽是多年从事研究国际经济学和比较经济学的专家，1990年9月30日，根据我布置的任务，江春泽送来了她整理的《外国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和实践以及对中国的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评论》。这份材料说明，计划和市场根本就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与社会制度没有关联，是后来苏联把它们联系起来，又自己弄个禁锢把自己套上了。

我认为，这个材料很好，要给上面送。大概一共印了20多份吧。我给江泽民、李鹏各寄了一份。

江泽民看到这个材料后，认为很好，讲清了问题。李鹏看了以后，指示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文件起草小组参考。中央办公厅也打电话来，要我们再加印二三十份送去。因为当时关于计划和市场的争论，不是在理论界，也不只是在具体实际工作部门，而是高层的看法有分歧，找到大家都能接受的说法显得十分迫切。

11月5日到7日，国家体改委在燕山石化公司招待所召开了“计划与市场国际比较研讨会”。我让江春泽把“计划与市场国际比较研讨会”的成果好好整理一下。12月3日，我将研讨会的纪要《苏东国家与我国在处理计划与市场上的不同看法，不同效果》一文报送李鹏总理。12月5日，李鹏作了批示：“已阅，写得



不错。关键是改革的目的是稳定与发展生产，而不是套那种自认为合理的体制模式。”

1992年3月20日至4月3日，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举行。4月1日晚上11点钟，我都睡了，江泽民总书记打

电话找我，他说：“改革的下一步怎么搞？你们是不是要好好研究一下，给中央提个建议。”他还说，他自己也在研究这个问题。会议结束，我就找了广东、山东、江苏、四川、辽宁5个省的体改委主任，在中石化总公司招待所

开了三天半的座谈会。座谈会结束后，我给江泽民、李鹏写了一封信，直接送他们亲收。我还在报告后面附了一张统计表，列举5个省1978年和1991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出口额、进口额、城镇居民收入、农民人

均纯收入等八项宏观经济指标，并以1991年同1978年的增长数字作对比，说明市场对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巨大作用。从对比中可以看出，凡是市场机制运用得活的地区，各项指标都大大领先。

1993年3月，我离开体改委到国家计委工作。当时，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是曾培炎，他也是国家计委副主任，他知道体改委搞了这个东西就要了过去。5月底，为准备召开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央成立了一个文件起草组，温家宝任组长，曾培炎和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维澄任副组长。文件起草组搞了差不多半年，形成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应该说，1990年到1992年的几年间，在认识很不统一、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很明确，而且坚持了我们的看法。从上报研究资料提供高层参阅，到提出政策建议，到我参加十四大报告起草小组，再到我们研究如何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体化，这个过程是相当完整的。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这个核心问题上，国家体改委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而且被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个作用是积极的、正确的。

我认为，中央决心设立体改委这个机构是正确的。因为改革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有权力、有利益的部门都不想让步，都要别人改，自己不改。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需要一个超脱于权力和利益格局之外的部门来研究、协调、仲裁、推动。我的体会是，这个机构的作用不应当低估。

体改委有很多工作都是比较超前的，的确有改革意识。比如说股份制，上市公司不到20年就发展到1600多家，最初只有14家啊。期货也是体改委提出来的。还有综合改革配套试点、县级改革试点，体改委都抓得很超前，而且诚心诚意地支持。

（《财经》2012年第30期）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谢明干

【上接1月19日01版】

（三）日本经济持续长期地萎靡不振，韩国经济呈下滑的态势

日本经济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达到高峰之后，连续20年陷于低迷，在零增长线上波动，被称为“失去的二十年”。受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以及本国大地震海啸的影响，日本进出口大幅下滑，公共债务高企不下，虽然一直实行货币宽松政策，但未见多少起色，2012年又由于在政治上向极右转，内政外交问题加剧，经济进一步恶化，第三季度经济萎缩3.5%，预测全年经济增长只有1.5%，2013年又降回到0.6%，今后几年的经济前景亦甚不乐观，日本人惊呼要出现“失去的三十年”。

日本是以贸易立国的。据日本财务省发布的数据，2012财年上半年（4月至9月）贸易收支逆差高达406亿美元，创下1979年有可比数据以来的半年度新高。个中原因，除欧债危机导致全球经济减速外，主要是日本国内核电站停运使液化天然气和原油的进口长期维持在高位，以及出口明显减少，9月份对欧盟出口同比下降21%，对中国出口下降14%。

日本过去有赫赫有名的家电巨头，由于创新不足，战略不当以及受世界金融危机、大地震的影响，竞争力已明显下降，产量锐减，出口大跌，都坠入了巨亏泥潭——松下2011财年亏损约100亿美元；索尼2012财年预计亏损29亿美元，已连亏8年；夏普在截至2012年3月底的财年里亏损38亿美元，等等。汽

2012：西方不亮东方亮 世界经济复苏步履蹒跚 中国经济转型稳健前行

车、钢铁及其他制造业的情况也不佳，汽车本车及零部件等的出口都大幅减少。这就严重影响到日本的国家财政收入，加上日本政府近年大大增加国防开支，财政捉襟见肘，国家债务已近1000万亿元，政府的财政收入约有半数来自发行赤字国债。按照日本法律规定，每个财政年度政府发行赤字国债的前提是国会通过，这就往往为党派纷争所用，加剧政局的混乱和社会的动荡。

韩国在全球经济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同中国的经济关系尤为密切。受全球经济低迷导致的出口放缓和内需不足影响，韩国制造业、建筑业、农林渔业和设备投资等方面均表现低迷，经济继续下滑，增幅低于预期。据韩国央行预计，如果欧债危机得到妥善解决和美国避开“财政悬崖”，韩国经济增长2012年为2.4%，2013年为3.2%，均比原先的预期下调了0.6个百分点；否则，经济情况将更加恶化，下滑得更多。韩国的出口依赖程度高达70%以上，而2012年以来出口与月俱降，第二季度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竟低于内需。但是内需的增长也面临很大的压力，主要是家庭负债已接近1000万亿韩元，负债比重世界第一，这就极大地伤害了家庭消费能力。韩国央行的数据显示，韩国国内消费增加率已连续39个月低于经济增长率，创下历史最长的纪录。韩国政府已采取了一系列包括金

融、营销、行政等方面的应对措施，诸如几次降低银行基准利率，下调中小企业总信贷限额的年利率，追加贸易使节团的活动经费，提高对非洲、中东、东盟等新兴市场贸易保险的扶持限度，强化关于扩大外贸的培训与咨询服务等，已取得了一定成效，估计经济可能于第四季度缓慢回升。

（四）发展中国家受发达国家的拖累经济增速放缓，但经济基本面良好并呈持续增长态势

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不仅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也深刻改变世界经济的格局，即使是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也未改变这一趋势。据统计，2011年新兴11国（E11）整体的GDP规模比20年前扩大了5.6倍，占全球GDP的份额翻了一番，远远领先于其他经济体。但是在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中，发达经济体金融危机的外溢风险日益严重，使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受到的负面影响日益加剧，目前各国都在采取各种有力的应对措施。例如“金砖五国”的巴西，预计2012年经济增长1.9%，原先预期为4.5%，巴西政府正采取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包括对汽车和白色家电行业减税，批准40个工业和服务部门免交企业社保金，降息并把基准利率维持在7.25%的历史最低水平等，以鼓励企业加大投资和刺激就业市场，经济

有望逐步回升。印度，由于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和消费者信心下跌，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的应对措施，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发挥金融杠杆的调节作用，如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至4.25%，目的是为市场注入流动性，刺激经济活力；从2011年3月起央行连续加息，把基准利率上调至8%以上，以遏制通货膨胀。预计印度2012年经济增幅将可保持6%左右。俄罗斯，经济的整体情况运行良好、形势稳定，预计全年增长3.5%左右，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原油出口和加入世贸组织的不确定性，另外通胀率也比较高（6.5%）。南非，2012年第一、二季度同比分别增长2.7%和3.2%，第三季度跌至1.2%，是2009年二季度以来的最低点，主要是受矿工大罢工的影响，预计全年增长2.5%，今后两年可望增长3.5%~4.5%。中国，则是亚洲地区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从地区来看，亚洲仍将继续为全球经济复苏提供驱动力，2012年平均增速有望达到5.4%，主要是由于东盟经济一体化进展顺利；非洲，增长势头保持强劲，预计增长5%，高于去年的4.8%，今后两年可达到5.2%和5.4%；拉美，情况也不错，预计增长3.2%，其中中美洲复苏较快，预计增长4.4%；情况较差的是东欧国家，由于直接受欧债危机的拖累，经济增长呈现出总体萎缩态势，其中以匈牙利、捷克较为明显。总之，在全球经济不景

气的大气候下，发达经济体困难重重，前景暗淡，而发展中国家亮点纷呈，为世界经济复苏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中国经济：放缓一企稳一回升

2012年世界经济的最大亮点，是中国经济在调整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中稳健前行，经济回升得比较早也比较快。

（一）全年经济同比增长7.8%左右，高于年初提出的7.5%目标。

其中一季度增长8.1%，二季度增长7.6%，三季度增长7.4%，四季度有望增长8%，这表明经济从以前的过热逐步回落，到三季度末企稳回升、稳步增长，并没有出现国内外不少人曾经很担心的“硬着陆”。经济增长百分之七八，是中国现阶段比较理想的速度，增长质量比较好，增长速度也比较快，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还在肆虐的情况下，在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经济陷于衰退或下降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能够达到这样的速度，来之不易。经济增速的适度回落，既是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必然结果，也是调结构、转方式的客观要求，不把增长速度适当放缓一些，调结构、转方式就难以进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既避免了经济“硬着陆”，又保持了经济比较快的增长，保持了宏观经济的良好运行，这将为世界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与极大的信心。（待续）

▼【紧接01版】

上游产业，如能源、交通、矿产、电信、金融等，重要任务是为下游企业提供生产要素、中间产品和服务，下游企业绝大多数是民营企业，如各式各样的制造业、建筑业、餐饮业、服务业等。在这种由上为国企下为民企组成的垂直的经济结构下，当时，由于2001年我们参加了世贸，国门大开，民营企业利用廉价劳动力，充分发挥市场的比较优势，参与世界竞争，为对外出口提供大量的产品，赚取了大量外汇。更重要的是，在此期间，上游产业或企业，可依靠国家权力，通过垄断价格，有计划地从下游企业中获取源源不断的暴利即超额利润。这就是当时国企之所以兴旺发达的根本缘由。

老子说：“祸兮福之所伏”。可是，好景不长。因为上游企业的暴利，并非其本身因效率提高创造的，而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是依靠权力从民企中转化而来的，因而在国企和民企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行动不协调和利益分割不均的矛盾。这种矛盾，在下游企业经营状况还好的情况下，不十分突出；一旦下游企业因国内或国际市场的运行不畅、劳动力因工资提高而使经营效益下降和利润率下滑时，必然会凸显并尖锐化起来。时下，我们已清醒地看到，国民经济出现的种种矛盾，如贪腐问题严重，贫富差距逐步拉大，金融体系弊端层出不穷，等等，大都是由此衍生出来的。如果此矛盾不能及时和很好地化解，必然会严重威胁我国整体经济的安全。

如何有效地化解这些矛盾？道路只有一

解决六个矛盾 实现“改革红利”最大化

条，必须加大和深化对处于上游垄断地位的国企进行制度性的改革，放权让利，消除垄断；降低上游企业的门槛，使民营企业也能进入，参与上游企业的竞争，使民企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优胜劣汰。通过民企的发展，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四是大城市和小城镇的矛盾。目前，在我国，大城市的发展快得惊人，一天一个样，三天大变样。我到过许多发达的国家，包括美国，还没有见到一个国家有那么多的大城市、特大城市，那么多的极为豪华城市。大城市的快速发展，是一件好事，但不是越大越好，越多越好。《红楼梦》中说“大有大的难处”！城市学告诉我们，许多国家的实践证实，大城市的发展，要有一定的限度，绝不是越大越好。中国是一个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短缺的国家，建设大城市，不仅要挤占大量的土地，包括农民的耕地，排挤农民的就业，减少粮食生产的土地面积，还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更重要的，大城市的发展还会产生许多“城市病”，如城市垃圾无法有效处理，造成社会的严重污染。相对来说，目前在我国，小城镇的发展十分落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为了推动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缩小城乡二元结构，全面实现现代化，扩大农民就业，增加内需，提高城镇居民的收益，改善他们的生活，改革社会面貌，重点不是发展大城

市和特大城市，而是要大力发展中小城市，特别是发展小城镇。

小城镇的建设，要因势利导，趋利避害，把生态文明理念全面融入城镇化的全过程之中，走集约化、智能化、绿色化、低碳化的新型道路。切勿贪大求全，讲求小而精，坚决防止把城镇化变成大城市化。

五是大富和小富的矛盾。我所说的大富，是指那些在改革中通过不正当手段或途径获得不义之财的财阀，即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万万富翁。

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就有财富分配不均的差别。实践证明，适当的差距，是社会发展所必要的。如将财富占有人为地拉平，搞平均主义，只能导致社会普遍的贫困。任何一个社会，要想得到正常的发展，必须建立与自身相匹配的合理的财产分配制度。一个社会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财富占有的差别，而是差别过大，从而富者恒富，贫者恒贫，堵塞了贫者经过努力可上升为富者的通道，使差距越来越大。历代王朝的衰败甚至覆灭，无不与此有关。

所谓合理的财产分配制度，必须做到对老弱病残、鳏寡孤独者有社会福利保障，对一般有劳动能力的人，只要肯努力进取就有晋升为富有的渠道或机会，使分配措施能在大力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上合理运作，就是好的分配制度。

小富，是指那些普通百姓，虽然在改革开

放中也得到一定的实惠，提高了收益，生活有所改善，比起改革开放前，富裕多了，但比起那些富得流油的大富翁来说，还是少得可怜。差距越大，违反社会公平、正义原则，加深了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之大忌。在今天，对那些富豪来讲，光靠纳税来调节，已经远远不够了，必须靠制度制约和法治严惩。

六是大权和小权的矛盾。我所说的大权是指中央集权和少数人的特权，小权是指地方分权、民权。目前在我国，在这个问题上矛盾多多，比较尖锐。它牵涉到国家宪法能否充分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否充分贯彻的大问题。

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问题上，我们是一个大国，也是一个大党，没有足以驾驭全局的中央集权，是难以想象的。但是，也不要因为强调中央集权，而影响地方分权。中央政府要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大胆放权，让地方政府能够拥有更大的改革空间，做更多有益于人民的事。事实上，中国很多成熟和具有深远影响的改革，都是从一个小的地方开始的，例如，农村土地承包制是从小岗村开始的，对外开放引入外资是从深圳开始的。尊重地方的首创精神，意味着更加充分发挥地方之优势，开展地区之间的竞争。很多地方政府为了促进经济发展，会竞相提高开放度，改善行政作风和商业环境，这有利于中国经济更快地发展。现在，我们有些地方正在进行进一步深化

改革的试点，比如成都的城乡统筹改革、温州金融改革等。但是，光有这些改革的试点还不够，我们必须有更多领域的改革，需要展开，需要深入，这都要地方有权去闯、去创。

在中央集权和公民权利问题上，也要多放点权。民权即民主的权力。民权始终被人们看作是寻求民主权力的永恒主题，也是被视为能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合理治理国家的制度安排。它的功能，集中表现为：安邦定国，国泰民安。

我记得，前些时候，一位记者问一位普通百姓：你认为，宪法权大，还是县长权大？受访者说，当然县长权大，因为县长有权随意抓人、打人、放人，而宪法不能。在理论界、学术界，在我看来，目前仍存在着一些与宪法精神格格不入的“雷区”和“禁区”。因而这种制度不顺民心，不合民意。这种制度非改不可，不改，不可能有宽松的气氛和环境，不足以引导科学文化的发展。宪法是国家治国理政的根本大法，宪法的意义在于贯彻实施，惠及天下，切不可在修订的时候大张旗鼓，兴师动众，一旦修订好了，就束之高阁了。

以上六组矛盾，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等诸多方面，均带有全局性，而且互相交叉、渗透和制约，形成一个多元性的矛盾网络，这正是我们面临的很多难题。如果我们将改革中，逐步予以化解或最终解决，这将是人民获得的怎样估计都不过分的“最大红利”。